

薪火學刊

第三卷

薪火學刊編輯部 編

 復旦大學 出版社

謹以此卷紀念章培恆先生八十二冥壽
暨逝世五周年

目 录

讲学篇

明代文学与哲学…………… 章培恒讲授 曾庆雨整理(2)

风范篇

初心不改

——章培恒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…………… 应必诚(12)

章培恒先生与《中国文学史新著》的增订 …………… 吴冠文(27)

切磋篇

“共和”的遗产

——民国初期文学文化的转型初探…………… 陈建华(36)

徐继恩、释正岳并非同一人辨析 …………… 陆勇强(60)

瞿式耜东皋草堂考…………… 王启元(74)

浙东学派与明初诗学的价值导向…………… 郑利华(99)

试论元代发迹变泰类型作品群

——以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为中心 …………… [日]西川芳树(117)

由流行读物到文化经典

——论“谢枋得解《千家诗》”在明代的流行(上) …… 查屏球(141)

关于中国文学影响的表述

——日韩汉文学史论著中相关表述之比较与检讨 …… 邵毅平(165)

李约瑟图书馆之藏书特色 …… 徐 艳(183)

《诗经》典故词语与《汉语大词典》订补 …… 苏 杰(198)

毛奇龄家世与生平考述 …… 胡春丽(212)

万历中期以后的“在朝王学” …… 邓志峰(231)

《建康实录》作者考 …… 季忠平(252)

上海清代中期学术著作概述 …… 杜怡顺(272)

古籍中的题跋不可尽信

——以《高季迪先生大全集》评点本之叶德辉、
章钰所撰二跋为例 …… 钱振民(298)

稿约 …… 《薪火学刊》编辑部(313)

往期回顾 …… (314)

讲学篇

编者按：

章培恒先生从教近六十年，先后为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开过中国文学史（先秦至魏晋南北朝）、《诗经》研究、《楚辞》研究、明代文学研究、中国哲学与文学、明代哲学与文学、《西游记》研究、中国小说史、中国上古—中世文学专题研究、13—20 世纪中国文学专题研究、中国文学思想古今演变研究、《反杜林论》研究、《神圣家族》研究、古籍校读法等数十门课程。他开本科生课程和硕士生部分课程时，采取自己主讲方式。他记忆超群，上课从不带讲义，一般仅带几本夹着纸片（作用同书签）的图书，用带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，不疾不徐，不蔓不枝，不重复，不啰嗦，缓缓道来，条理清晰，逻辑缜密。若听课者笔记记得完整，就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演讲稿。

本刊新辟“讲学篇”栏目，陆续发表根据章先生讲课整理而成的部分文稿。这些文稿如实记录了章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，自有其重要学术价值。章先生于 1989 年秋为复旦大学古籍所举办的“元明清文学助教进修班”学生讲授“明代文学与哲学”，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曾庆雨教授作有详细的听课笔记，她现已将之整理成稿，复经陈广宏、郑利华两位教授审订。本卷刊出的是由陈广宏教授审订的第一部分。

明代文学与哲学

章培恒 讲授 曾庆雨 整理

一、先秦至元代文学与哲学

先秦在哲学上有两个派别：儒和道。儒注重集体与道德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，个人为集体牺牲。文学上表现为自我表现与集体的一致性。《诗经》中少有激情，尽量抑制个人的情绪，调整个人与集体的关系。如《诗经·将仲子》。这种创作精神与儒家的，特别是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。这并非是孔子影响《诗经》，而是社会环境造成的。道家比较注重个人，要求注重个人的生命。庄子的著作中表现明显。他把个人生命放在第一位，集体则是次要的。文学中《楚辞》较为明显。屈原被认为是爱国的，可是不论是爱国还是自杀，出发点都是他自己，他在《离骚》中说：“忽驰骛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。老冉冉其将至兮，恐修名之不立。”所以，他追求的是他个人永恒的名和生命，因而会出现与一般观念不同之处。如对待君王，他就骂“昏君”，换言之，忠君爱国是从个人要求出发，一旦对立，他就会指责痛骂。这与儒家不同，而与道家相通。这说明先秦哲学与文学的关系，但不是哲学影响文学，而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社会存在。当然，其中还有经济基础和地理环境的影响，由此而产生了南北哲学思想和文学的不同。《诗经·噫嘻》中讲到当时的生产有“十千维耦”，维耦，即二人协力耕作。这种社会生产谈不上个人的价值，个人必须与集体

配合。而南方的劳作是分散的,人的求生手段也相对多样,也就较为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。

汉代儒家思想成为主导。汉武帝尤甚。但儒家也产生了不同的派别。孟子在汉代没有什么地位,孟子与孔子并肩是从唐代韩愈开始的。汉代所尊的是孔子和荀子。尊荀是因为他是法家思想的祖宗,秦时法家是主导思想。汉代对法家思想有所继承,统治上是王道与霸道并重。霸道离不开法家,法家离不开荀子。因为荀子认为“性本恶”,仁义道德都是人为而非本性,要靠后天的教化和刑法来抑制本性。汉代王道与霸道杂用,所偏重的就不是孟子的“性善”论,而偏重荀子。孟、荀相比,孟子更为儒家化,他认为人在思想上不守儒教便失去了人性。但他的这一套,是与人的真正要求相反的。而荀子对人的思想控制则相对放松,由于人性恶,所以那些对生活的追求欲望都是符合人性的。只是要加以改造,用仁义道德控制其过分膨胀。这种思想在汉赋里表现出来。汉代大赋歌颂的是人的一种生活享乐,一种美好的、奢侈化的享受,到最后说几句劝导的话,“曲终奏雅”,起到“讽一劝百”的作用。这就形成了一面鼓励人去追求享乐,一面又劝谏的特殊文学样式。这在以后,程朱理学起来,荀子被冷落,就不再有了。另外,汉代的诗歌,如李延年的《佳人歌》:“一笑倾人城,再笑倾人国,宁不知倾城与倾国,佳人难再得。”这就是荀子的人性道德冲突的表现,荀子的哲学认为人性与道德本来就是冲突的,只是要用仁义道德来控制。所以,汉代文学反映的明显有儒家个人与集体调和的色彩,但还能看到个人与道德冲突以及个人享乐的痕迹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主要是南朝,老庄思想占了显著的地位,不仅与儒家比肩,甚至有超过之处。这时的老庄学说已有所发展,已考虑到某些个性自由的问题。庄子认为,人为了生命可以牺牲个性,人的生存应处于一种才与不才之间。这种生活态度对个性有一种限制,个性是否发展要看能否为生命的存在服务。而嵇康等人则已经较为注重个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,如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他强调人的个性是重要的。陶渊明也具注重个性的思想。由于当时的这种哲学思

想,文学中也就比较重视个人、自我,文学思潮总体表现出追求个性、尊重自我的倾向。如谢灵运的《述祖德诗》有“达人贵自我”,汉代贾谊《鹏鸟赋》有“小智自私兮,贱彼贵我;达人大观兮,物无不可”。这一比较就可看出区别:谢灵运认为达人是贵自我的,而汉代的贾谊则认为达人是达观的,如自我就是小智,就是小私。这是因为贾谊主张得意时秉持儒家思想,不得意时秉持道家思想。而谢灵运则是发展了的老庄思想,他认为人的本能是应该写的,因为这些是人的本性,总体上使人感到可爱。另外,着重写的是生命的脆弱与悲哀。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悲哀与悲观,完全是战乱的结果,是一种生命短促的悲哀。因为人活着才能有一切享受,而死了就没有这种愉悦,所以,死是极为可怕的。不仅如此,衰老也很可怕。所以桓温这样重事业的人,也感慨“物犹如此,人何以堪?”这就是一种人生无常的悲哀,这也是注重自我的结果。六朝的文学与哲学联系紧密,强化了生命短暂的悲哀。

隋代,儒家思想抬头;唐代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倾向。而在此之前,北朝还是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,苻坚在北方建立了强大政权,他禁止老庄思想,而南朝则盛行老庄。南北朝形成后,南朝文学对北朝有影响,如庾信等南朝作家北移,然总体上北朝文学缺少南朝的特色。隋统一了全国,所以儒家思想又占了主要位置。唐也进一步提倡,太宗时代搞了《五经正义》,这是唐代的官书,又重新把儒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,但基本上承汉代注,无新的发展。唐中期,韩愈提倡孟子,他认为孔子以后是孟子,孟子以后无人。但宋代又把他和孟子相提并举。王安石《奉酬永叔见赠》:“他日若能窥孟子,终身何敢望韩公?”这可以看出王安石是认为韩愈比孟子略高,因为韩愈才高文雄。程朱理学兴起后,韩愈被遗忘,而实则提倡孟子,韩愈是第一人,李翱是承韩愈之后,提倡孟子思想的。这时孔孟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主导,唐代文学也就有了明显的变化。尽管提倡儒学,但经过魏晋六朝倡导老庄的影响,有一个演变的过程。李白诗可谓是六朝思想传统与唐代新精神混合的产物。他既有强调个人个性的一面,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(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);也有“大

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”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”（《古风》）这样的认识。陈子昂也是如此，他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一方面是强烈的个人孤独感，一方面是人生无常的悲哀：以自然的博大来衬托个人的脆弱与渺小，这正是六朝传统。而到杜甫，虽有旧传统，但新精神占了主导地位。他的诗中有“朱门酒肉臭”，也有以葵花向阳作比喻的忠心表白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；他看到人民的苦难，而又安慰欺骗人民，求得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平衡，如“掘壕不到水，牧马役亦轻。况乃王师顺，抚养甚分明。送行勿泣血，仆射如父兄”（《新安吏》）。

韩愈出来以后，原来在杜甫诗中还有一点的个人要求则看不见了。这是因为荀子是讲利的，而孟子不讲利。这一点在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中就看得很清楚：“王，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孟子认为国家讲利，大夫、士、庶都讲利，国家便维持不下去。而荀子则认为：“不利而利之，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。不爱而用之，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。利而利之，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。爱而后用之，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。”（《荀子·富国篇第十》）荀子认为这才是取天下的国君，给人民好处，再从人民那里得到好处；爱人民再使用他们而保住社稷的好方法，否则就是危害国家。荀子反对墨子的节俭，他认为节俭是使国家贫穷的方法。他这是肯定人的欲望，承认人的私心、自利，不主张取消人的私欲。他主张“性恶”，就是要用道德规范来约束，不使恶性膨胀，但他的前提是肯定人的。而孟子则相反。韩愈以来，人们将孟子理论作为孔子理论的正统解释，把儒家思想立为正宗，排斥人的欲望，否定人的生活欲望，把文学作为宣扬仁义道德的工具。韩愈就认为要“文以载道”。而在曹丕时代，由于老庄思想占主导，提倡的是“文以气为主”。气，就是气质和才能。他认为文学要完全表现人的力量，如《垓下歌》这类作品。陆机讲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，是以人的感情为创作基础，而不以政治或是否合理为标准。

唐代中后期，白居易提倡新乐府，但他不认为个人欲望是要完全否定的。他认为只要符合“道”，个人欲望也是可以表现的。代表作是《长恨歌》，作品既批判又同情。其实，他批判唐明皇的昏庸，而他

本身也是一个好色之徒。他自己有两个漂亮的侍姬，一个是樊素，一个是小蛮。当时有诗云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”。这说明他与唐明皇在感情上有相通之处，其中也投入了自己的感情，才有了“孤灯挑尽未成眠”。有人批白居易此句是“穷酸句”，说的乃是白居易的感受，皇宫中怎能挑尽孤灯？所以不是纯正的载道之作。

韩愈的作品都较为符合载道的原则。如他的《山石》：“山石荦确行径微，黄昏到寺蝙蝠飞。升堂坐阶新雨足，芭蕉叶大栀子肥。僧言古壁佛画好，以火来照所见稀。铺床拂席置羹饭，疏粝亦足饱我饥。夜深静卧百虫绝，清月出岭光入扉。天明独去无道路，出入高下穷烟霏。山红涧碧纷烂漫，时见松栌皆十围。当流赤足踏涧石，水声激激风吹衣。人生如此自可乐，岂必局束为人鞿。嗟哉吾党二三子，安得至老不更归。”韩愈认为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好，“人生如此自可乐，岂必局束为人鞿”。这与李白的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句有相通处，但李白追求的是一种热烈的生活，自由而奔放。而韩愈追求的则是安贫乐道的生活，是对生活欲望自觉的抑制。又如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：“人生由命非由他，有酒不饮奈明何？”他认为张功曹为官不得意是命中所定，不必发牢骚，不要与时政、与统治者相抵触。凡是与封建统治者相抵触的愿望、感情，都要抑制，所以个人的一切都要符合“道”。但韩愈的思想不完全占统领地位，因此，唐后期还有李商隐、韩偓那样的作家。

宋代以来，王安石等提倡孟、韩之道，程朱理学则更提倡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为此，他们讲修养，主“静”，要人整天处在自我抑制的状态之中，主张“慎独”，哪怕是独自一人，也要不产生人欲。程朱理学具有一种思潮垄断的趋势。司马光和王安石尽管在政治上是对头，但伦理道德的修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。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，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。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，人的追求随城市的发展丰富起来，但生活水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。统治者提倡理学，要人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以维持统治。自我抑制的文学是宋代文学的特色。宋诗完全是理智的东西，唐诗好的多带有感情色彩，宋诗则没有了激情。揭露现实的都有分寸，尽力不涉及皇帝或上层统

治,而且同时还做自我批评,因为作诗的人也是官僚。所以作品中尽量削弱、调和矛盾,这不仅可向上交代,也可向人民交代。由此,宋诗多是理智的,即如江西诗派“夺胎换骨”“点铁成金”等技巧,也是一种理智的产物。

宋代文学有激情的是宋词,但仍有理智控制,仍是有分寸的,是为统治者所能忍受的。如范仲淹的《苏幕遮》是感情深入、丰富的作品:“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阳天接水,芳草无情,更在斜阳外。黯乡魂,追旅思,夜夜除非,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,酒入愁肠,化作相思泪。”这首词写的是离情,其中怀念的是自己的夫人,是正常的感情,这是道德所允许的。而道德不容许的会隐晦,如柳永写的《雨霖铃》中“执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噎”,写离别的难舍之情,但他不说明是与谁有如此缠绵之情。尽管感情深细,但仍不用强烈的词句表现,因为强烈的感情容易扰乱人的思想,与道德不符。晏殊《浣溪沙》:“一曲新词酒一杯,去年天气旧亭台,夕阳西下几时回?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,小园香径独徘徊。”所写的是一种人生无常的悲哀,这种悲哀六朝时期就有很多。用此词与陈子昂的诗比较,陈子昂表现的是一种无可慰藉的悲哀,晏殊的词则是一种获得安慰的悲哀,即在绝望中得到一种安慰,是绝望与宽慰两种感情的混合。这种感情混合在苏东坡的《前赤壁赋》中也可以感觉到,文章开始仍是一种人生无常、个人渺小的悲哀,但苏东坡认为:从“变”来讲,天地万物有尽;而从“不变”的角度来看,刹那便是永恒,天地与我皆是无尽的,所以不必悲哀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,中国诗歌从杜甫以后表现是乐观的,而六朝是悲观的。为什么宋词中没有深沉的、强烈的悲观呢?因为深沉强烈的悲观情绪是与宋代的道德修养不一致。宋代的道德修养要求人处于一种静态中,在静态中观察,才能懂得宇宙的道理。如果感情冲动,就不能客观地把握宇宙、社会的道理,而只有静默,才不会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冲突。所以,强烈的欢乐与悲哀都是不行的,这与当时理学界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。随着宋代文学的发展,中国文学成了理智的、自我控制的文学,到元代基本延续下来,没有大的变化。

元代戏曲不同,多为下层文人所写,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正统理学的熏陶,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感情欲望的依恋,不过在思想上也没有吸引人的东西。王国维《宋元戏曲考》中认为,元杂剧的思想是糟糕的,就连《窦娥冤》的思想也是平庸的,宣扬节、孝,认为地方政治应该清廉、清明一点。作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强烈的感情,如无感情色彩,这就是一出相当平庸的戏。元代的诗文基本上是理智思维的产物。戏曲作者虽没有思想上的突破,也没有严格的修养,但能强烈地流露自己的感情,即可谓一种突破。

元末以来,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,诗文有所改变,主要以杨维桢、高启为代表。这是江、浙地区的文学,他们受到陆象山哲学的影响,而陆氏哲学是宋代理学的一种。当时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种理学,所谓“天理”是离开人的意识而存在的,同时又是决定宇宙的力量。陆氏理学则认为“理”并非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,归根到底是人的意识的产物,是“心”的产物,它是宇宙的决定力量,因而整个宇宙是“心”的产物。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。尽管如此,他们都是反人欲的。陆象山认为,人欲(自然欲)不是人心所生,而是后天的产物,要加以制约。但陆氏学说对统治者“君权神授”的合理性而言就有了漏洞:既然宇宙是心的产物,意味着宇宙是大众的,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,心就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者:“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即是宇宙。”这种思想本是禅宗那里来的,那可说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老庄结合的派别。禅宗有静坐瑜伽功,达到抑制意念的功效,这是坐禅的功夫,把“心”的作用看得很高。所以,要修炼心性,达到清静澄澈的境界。这里还有一个风动还是幡动的著名故事,《红楼梦》里则有一个六祖偈语的故事。禅宗要使“心”不受污染。陆象山的哲学也是这样,要排除掉人心的欲望,但“宇宙便是吾心”的观点,引申开去便是无我就无宇宙,这样就会演化成一种强调个体自我的思想。而元末出现了这种思想倾向,以杨维桢、高启为代表,就是这种哲学思想在文学中的反映。杨维桢的《大人词》:“有大人,曰铁牛,绛人甲子不能记,曾识庖牺兽尾而蓬头。见炼石之女补天漏,涿鹿之帝杀蚩尤。上与伊周相幼主,下与孔孟游列侯。衣不异,粮不休,男女欲

不绝，黄白术不修，其身备万物，成春秋。故能后天身不老，挥斥八极隘九州。太上君，西化人，自谓出于无始劫，荡乎宇宙如虚舟，其生为浮死为休。安知大人自消息，天子不能子，王公不能侑，下顾二子真蜉蝣。”大人，即杨维桢自己。绛人，《左传》里的一个老人。庖牺，伏羲。该词的题目是从陆象山那里来的，陆氏曾经写过同题诗。而且该词中表现出来的精神，正是陆象山哲学观点从另一方面发展的结果。这就是因为我心是至高无上的，所以“天子不能子，王公不能侑”。子，以我为子，统治我。侑，并驾齐驱。

陆象山的哲学不仅在杨维桢的作品里转化成了重视个人的思想，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喊出的情也是空前的。杨维桢诗的出现，使中国文学中有了一种把个人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作品，这就可以进一步把个人的思想看成至高无上的。同时，就可以于传统的东西采取鄙视的态度。杨维桢的《道人歌》：“道人飞来朗风岑，玄都上下三青禽。搏桑已作青海断，鳌丘又逐罗浮沉。初见蜃精生月腹，前身捣药婆娑明。还仙服食终恍惚，天上仙骸成积林。手持女娲百炼笛，笛中吹破天地心。天地心，何高深，八千岁，无知音。”从文学上看，该诗艺术性比《大人词》高，但反映出他对“道”的不相信。他认为整个宇宙中无人理解他，同情他，他是寂寞的。他把一切的观念都放在他脚下，只有他最彻悟，也最孤独。这与近代西方强调个人的哲学是相近的，是重视感情、重视个人享乐的诗。当然，他也有继承传统的一面，这是难免的。他重视个人感情以及享乐的诗作，代表性的有《花游曲》《城西美人歌》《春芳曲》等作。“春容不在芳，春华不再扬。我欲系春阳，春阳不可系。我欲系游丝，游丝徒尔长。飞来双蛱蝶，缀我罗衣裳。顿足起与舞，上下随春狂。”（《春芳曲》）这首诗表现人生短促、时光一去不返的忧思，从中可看到人和自然混为一体、尽情享受的景象。人生苦短的感慨是从古就有的，但杨维桢的《春芳曲》中，首先是一种天真的幻想，采取没有节制的方式来表示这一幻想。于“人生苦短”不是采取悲哀的形式，而是欢乐的形式，抓住美好时间，尽情享受，表现一种天真的情趣，对生活的热爱——爱物质，享受生活。李白诗中曾出现的“天真”，在宋人诗中已经看不到了。苏轼诗词的

洒脱,其实是进入一种不自觉的克制。杨维桢的诗则是这种“天真”的恢复。另外,是无拘束的感觉。当然,不能不受一种自然的限制,但他仍能冲破限制,得到欢乐。这种冲破就是一种气势,李白诗中也少看到这种冲破一切、寻求欢乐的气势,这与杨维桢认为我心至高无上的思想有关。而李白终归是有一种大志,想做一番事业;杨维桢虽也有大志,但或很快就抛弃,或不予重视。李白由于大志不成,也在诗中带有轻微的悲哀;杨维桢由于不重视,所以他无此哀痛。这也是当时市民心态的反映,即胸无大志,追求的是一种享乐。我们看到,在《春芳曲》中充满了感情的东西,不是理智的。

与杨维桢同时,而比杨维桢年轻得多的另一位诗人是高启。他的作品也重视个人,但与杨维桢诗的表现形式不一样。杨维桢的诗明显把个人凌驾于一切之上,高启的诗表现的是个人受到抑制后的悲哀,自我丧失后的一种苦闷。如《池上雁》:“野性不受畜,逍遥恋江渚。冥飞惜未高,偶为弋者取。幸来君园中,华沼得游处。虽蒙惠养恩,饱饲贷庖煮。终焉怀惭惊,不复少容与。耿耿宵光迟,撼撼寒响聚。风露秋丛阴,孤宿敛残羽。岂无鳧与鹭,相顾非旧侣。朔漠饶燕云,梦泽多楚雨。遐乡万里外,哀鸣每延伫。犹怀主恩深,未忍轻远举。恍令寄边音,申报聊自许。”所畜者代表作者自己,也写出了他的孤独。《喜家人至京》:“海鸟那知享钟鼓?野马终惧遭笼鞞。江湖浩荡故山远,归梦每逐鸿南飞。”这是明初在南京做官时所作,写出了感到不自由的心境。他多用“野”的形象自喻,这种形象是要自由的象征,而他却始终没有自由。要自由而不可得,这种悲哀、苦闷是文学史上一种新的东西。无论是李白、杜甫还是苏轼,都没有此种悲哀。这是因为李白、杜甫、苏轼的时代,个体的自我不像高启时那样受到重视。在此之前,六朝比较重视个人,但文学家多为贵族,自我受到抑制的苦闷相对比较轻,而且重视自我亦没有达到高启时代的高度。

高启、杨维桢的诗,虽然表现形式上大不相同,一沉一扬,但实际上都是同一思想的产物,是陆九渊哲学向个人方向推导的结果。正由于高启的诗重视个人,所以他的诗既有个人受到抑制的苦闷,也有

对人生的一种贪求,如《香水溪(在吴故宫)》:“粉痕凝水春溶溶,暖香流出铜沟宫。明月曾照美人浴,影与荷花相间红。玉肌羞露谁能见?只有鸳鸯窥半面。绛绡围掩怯新凉,归卧芙蓉池上殿。空洗铅妆不洗妖,坐倾人国几良宵。骊山更有汤泉在,千古愁魂一种销。”写的是他想象古代美人沐浴的情景,表现出他的一种大胆,与程朱理学“灭人欲”是相反的。香水溪是他心中的想象,美人也是他心中的一种想象,一种感觉。他敢于写出来就是对理学的反动,这使我们联想起郁达夫的作品。对美人沐浴,他的想象是细腻的,这是一种对个人欲望的肯定,是重视个人的结果。这首诗中有高启的感慨。对倾国美人使国君失国该如何评价?高启有自己的看法:虽失国,但与美人在一起,愁魂亦销却。因为人生的悲哀是与生俱有的,要消除悲哀,只有与美人在一起。虽说失国是一种悲哀,但人生的悲哀得到了解脱。这涉及人生的意义何在。高启认为,只有欲望得到满足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。他认为人生并无意义,只有游戏才具意义。他的思想与传统是相反的,与先秦时期杨朱“唯我”的思想有一些相通,使重视个人的人生观提到了很高的高度。诗中所表现的,与杨维桢也有相似之处。

(整理者: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)

风范篇

初心不改

——章培恒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

应必诚

我还是像他生前一样称呼他老章吧！2001年夏天，我家搬到学校新建的兰花教师公寓。公寓坐落在安波路南北两边的265弄和266弄，我家在南边265弄。不久，老章也搬到安波路200弄一个新建的小区，就在266弄的隔壁，我们斜穿过马路二、三分钟就到了老章的小区。老章搬到安波路来，我们都感到很高兴。

—

1999年老章检查出患有前列腺癌。前列腺是身体相对独立的部分，如果能休养好控制好，病情发展会比较慢，也是完全可以治愈的。如果转移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，就很危险。2011年夏天，老章CT检查显示肺部有阴影，有了转移的迹象；不久，就确诊多个部位癌变。知道这个情况后，我内心非常焦急，未经联系，就匆匆穿过马路去看他。但走到他家门口，我又犹豫了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，我能说些什么呢？房间里已有三个学生，正在与老师热烈地讨论问题，从他们表情里，我推断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老师病情的变化。他们见

我来,主动退到后面的饭桌边上去聊天。交谈中老章对我郑重地说:“我这一辈子遇到许多好人。”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,让我听起来有告别一生的意味。我难以面对这样严酷的问题,就避开了这个话题,但我很清楚他这句话包含着怎样刻骨铭心的内容和意义。

我是1953年夏季进复旦的,入学不久,就知道老章是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,他那时还刚毕业,就已经负责一个系的党的工作。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地下党员,入党时只有15岁。我们远远见到他,都会投去钦佩尊敬的目光。时间已经过去近六十多年了,岁月抹去了许许多多的记忆,但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,系党支部每学期都要召开一到两次吸收新党员的会议,每次开会都欢迎全系的教师学生参加,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,气氛热烈而庄重,主持会议的就是老章。支部大会通过申请人的入党申请以后,老章都要代表党支部委员会作简短的总结发言。发言中通常都有两句话:一句是某某同志入党动机是纯正的:是指申请人入党动机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,而是为人民服务,为党的事业奋斗。另一句话是某某思想发展是合乎逻辑的,这是考察申请人对党的认识。申请人在入党申请时,要向党组织讲清楚对党的认识及其过程,如果这个过程是真实的、可信的,也就是合乎逻辑了。这两句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参加会议回来的年轻人心里都是热乎乎的,纷纷向党的组织表达入党的愿望,老章也成为当时年轻学生的“偶像”。时间过去六十多年,几个同辈的老朋友在一起,回忆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,还会用这两句话调侃他:思想发展是合乎逻辑的,难道有不合乎逻辑的思想发展吗?他不作回答,只是笑笑。

1955年老章因胡风-贾植芳事件的牵连,被开除党籍,调离中文系到校图书馆工作,从此我们就很难见到他了;两年以后,他又回到中文系工作,但在党的会议上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
他说的“好人”指的是,在他身处逆境时,理解他、帮助他、支持他、鼓励他的老师、同事和朋友。他们在政治寒冬的季节,给他送去温暖。他在担任支部书记期间,作为党的一名基层干部,就生活在群众中,处处事事以身作则,对学生、同事的生活思想,了如指掌,工作